

目 录

绪 论	1
时代背景	2
哲学转型	5
发展线索	12
后现代主义哲学	18
基本评说	23
几点说明	27

第一篇 意志哲学与生命哲学

第一章 叔本华	33
第一节 社会背景	33
第二节 表象与意志	38
第三节 理念论	55
第四节 自由意志论	70
第二章 尼采	83
第一节 尼采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84
第二节 “超人”	99

第三节 道德谱系	114
第四节 “永恒轮回”	135
第五节 论悲剧	147
第三章 柏格森	163
第一节 “时间-绵延”观念及其历史贡献	164
第二节 “时间-绵延”与“内在化”问题之展现	172
第三节 “意识-自由”与“直觉”	176
第四节 生命冲动与道德宗教	178

第二篇 新康德主义

第四章 早期新康德主义	187
第一节 朗格	189
第二节 里尔	197
第五章 文德尔班与西南学派	205
第一节 文德尔班	205
第二节 李凯尔特	213
第三节 价值与道德	224
第六章 柯亨与马堡学派	229
第一节 柯亨	229
第二节 卡西尔	244

第三篇 现象学

第七章 布伦塔诺	263
第一节 描述心理学	265
第二节 心理现象与物存论	277

第三节 布伦塔诺与胡塞尔	287
第八章 狄尔泰	292
第一节 生平与著作	292
第二节 精神科学的概念	297
第三节 精神科学的体系	307
第九章 胡塞尔	327
引 言	327
第一节 生命与思想的历史脉络	330
第二节 时代背景与思想传承	345
第三节 哲学体系的阶段性展开	354
第十章 舍 勒	403
第一节 生命的历程	404
第二节 现象学的哲学	410
第三节 哲学：作为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的统一	436

第四篇 存在哲学与解释学

第十一章 克尔凯郭尔	453
第一节 生平、著作及研究概述	453
第二节 告别思辨哲学	459
第三节 走向现代哲学	464
第四节 “真理”与“信仰”	475
第五节 对基督教神学的解构：“个体”与“单一者”	484
第十二章 海德格尔	491
第一节 生平与著作	493
第二节 思想的形成	502
第三节 《存在与时间》（上）	521

第四节	《存在与时间》(下)	549
第五节	思想的转向	564
第六节	后期思想	570
第十三章	雅斯贝斯	591
第一节	生平与学术背景	591
第二节	生存与历史性	597
第三节	交往与关联超越	605
第四节	超越与密码	612
第五节	哲学信仰与宗教信仰	620

绪 论

“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是指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大陆现当代哲学，上溯黑格尔以后的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下至当下发生的后现代哲学。由此观之，在我们这套书中，本卷所讨论的问题皆是与我们“最近的”。这样说有两个理由。一是从地理上看，欧亚大陆本来就联系在一起，它不仅使欧亚两大洲的人员往来、物品交换、经济互补相对便利，而且也使我们在思想、文化、艺术、习俗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二是从时间上看，本卷不像此前的各卷讨论的都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哲学问题，而是专门涉及现代和当代哲学，就是最远的叔本华哲学，距今也不过一百多年。而这恰恰是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日益被我们引进的同时，象征着西方文明的西方哲学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不仅西方的传统哲学通过大学讲堂和书本被我们所认知，而且在欧洲大陆发生的哲学思潮也会很快波及到中国。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当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由理论变为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我国得到传播和普及。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把当时流行于西方的哲学流派介绍到中国来，如非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当代的通信技术更是把我们居住的星球变为“地球村”，当下的欧洲大陆哲学思想不可能不为我们所知晓，不可能不对我们有所影响。

但是，“最近的”并不意味着好读易懂。相反，由于现代西方哲学

学说纷繁复杂，派别林立，更由于当下的欧洲大陆哲学思潮本身还在发展变化，尚无定论，所以，当我们面对它们的时候，常常犹如雾里看花，莫衷一是，对它们的解读、分析和把握，丝毫不比研究传统哲学容易。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与西方的接触大大多于从前，不仅引进了不少西方哲学原著和哲学刊物，邀请国外学者来华演讲或讲课，而且许多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都在国外留学、进修、访问过，他们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同时，还直接与外国哲学家对话交流，经过自己的分析、思索和研究，在微观的认识和宏观的把握上都更为准确和科学，纠正了我们以前对现代外国哲学的一些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和看法，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充实了我国外国哲学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我们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本卷得以完成的基础。

下面，我们着重对现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时代背景、发展线索、主要内容、基本评说和本卷的编撰特点予以简要的说明。

时代背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果说由笛卡尔开创，经过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直至黑格尔发展到巅峰的理性主义哲学从 17 世纪直到 19 世纪上半叶占据欧洲哲学舞台的统治地位，它们体现了这个时期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的理想和精神，那么，此后在欧洲大陆发生的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哲学思想同样是现代和当代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在思想领域的曲折反映。

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欧各国的工业革命发展迅速，许多生产部门都采用了机器生产。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金融资本、造船业、纺织业的发展和殖民掠夺，都给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紧随其后

的法国，虽然在整个 19 世纪都动荡不安，但资本主义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证券交易、奢侈品、服装业、冶金等部门都相当发达。与此同时，封建与反封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与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法国产生的。与英、法相比，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晚，而且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改良方法，由地主经济缓慢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普鲁士道路”。但是，后起的德国凭借其先进的冶金、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军火工业，在 19 世纪末已经超过英、法，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欧洲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欧诸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虽然更晚一些，影响也不如英、法、德那么大，但总的来说，它们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初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这时的欧洲在把它的大批工业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把它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哲学思想都传输到世界各地，其影响范围远播到北美、亚洲、澳大利亚、非洲、拉美诸国。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欧洲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已经发展得相当高。先进的冶金、机器制造、化学、电气等工业部门得到迅速地发展和普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远距离送电获得成功，工业电气化也开始实现，电灯、电话、电车、无线电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也刺激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然而，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相反，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周期性危机的加剧，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及至 20 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 Spengler）已经哀叹“西方的没落”。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苦难的雅斯贝斯在战后满怀哲学家的责任感，对欧洲的现状感到失望，对现时代的精神状况提出了严厉批

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使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比以前和谐安宁,相反,因为利益、信仰、意识形态的不同,人类的道德和文明水平明显下降,甚至还出现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自身进行集体大屠杀的绝对恐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刺激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在西方国家原先表现为激烈对抗的各种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欧洲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大约在60—7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先后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也就是说,伴随着现代航天航空技术、计算机、通信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西方社会由原先的传统工业社会逐步进入信息社会。^①但另一方面,这时的欧洲还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欧洲的发展,同时对欧洲的文化和哲学也有一定影响。经过长达四十多年的分裂,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才重新获得统一。然而,此时的欧洲已经不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欧洲,黑格尔眼中的“世界心脏”、“世界精神的家园”已经成为历史,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概念,而不是以前那种以语言和民族为划分依据的民族国家的联合体。^②

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欧洲大陆可说是风云激荡、翻天覆地,而这种时代的变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必定是广泛、深刻的,甚至是激烈的。尽管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纷繁复杂,派别林立,但它们正是这种时代状况在精神领域的体现。只不过是因为哲学的理论形态比较抽象,人们有时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与时代的关系。

① 参见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梅艳译,第10—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② 参见鲍姆加登:(H. M. Baumgartner)《欧洲——哲学的命题和任务》(*Europa als Thema und Aufgabe der Philosophie*),载于《欧洲的精神遗产》(*Das geistige Erbe Europas*),第101—102页,那波里,维瓦利姆出版社,1994。

哲学转型

现在，当我们对欧洲大陆现代哲学进行反思的时候，首先遇到一个难题，就是黑格尔以后的欧洲大陆哲学是如何过渡和发展到现代哲学的。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学术界在最近一些年有这样的看法：在黑格尔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哲学杂乱无章、没有头绪，这个时期是欧洲哲学萧条凋零的岁月，只是到了 19 世纪末胡塞尔建立现代现象学，当代西方哲学才得以真正确立。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必须予以具体的分析，尤其是要澄清欧洲哲学在这个转型时期的基本脉络，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说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由来。

我们知道，理性主义哲学自 17 世纪以后在欧洲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理性成为解决存在、知识、真理，乃至人生观和世界观等重大问题的根据、准则和方法。直至黑格尔，理性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根据、本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过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或表现，它们由绝对精神而来，经过漫长的辩证运动，最后又回归到绝对精神那里。理性主义原先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但到了黑格尔那里，貌似圆满的理性主义最后又回到概念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实际上是把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极端。

“泰极否来”。当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如日当空的时候，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却并没有出现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模式，倒是在德国本土，哲学思想仍然很活跃，连黑格尔哲学也不能一统天下。还是在黑格尔在世和去世不久，德国古典哲学另一位代表人物谢林就对黑格尔以概念为中心的哲学思想提出批评，只是谢林本人虽然也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并要求将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去推动哲学的发展，但他却把解决问题的中心放在神话和宗教那里，从而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根本不可能推翻黑格尔哲学。真正摧毁和颠覆黑格尔哲学的，是在黑格尔去世以后的几十年。这里既有 19 世纪下半叶之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生巨变的外部原因，也有

哲学本身必须适应社会变化而发生转型的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在这里应当看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完全脱离发生在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自然科学状况有关的，他们的基本哲学思维方式是启蒙运动以后所确立的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其自然哲学的基础则是古典物理学。因而，他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站在主体性的立场上把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这种理论形态最终必定会形成理性的独断。这样，当自然科学继续进步，并在 19 世纪建立起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及生物进化论这三大成果以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黑格尔用思辨的幻想去代替现实世界的联系就必然会走向没落，并被人们所抛弃。所以说，从外部来讲，对黑格尔哲学真正的重大打击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当时的欧洲，不仅英、法等国的自然科学家不理睬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就是德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渐抛弃了抽象思辨的自然哲学，转而注意经验和实验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成果越是辉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就越被认为失去价值。当然，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步，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过去被当做联系物理的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之纽带的直观已经被推翻，空间和时间被归结为主观化的过程，经验的和实证的方法已经被证明不是认识世界、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然而，这时距离黑格尔时代已经有了约一百年。

与自然科学巨大进步相对应的，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崛起。这一派哲学家首先产生在经验主义哲学和具有唯物论传统的英、法，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穆勒和法国哲学家孔德。他们在理论上继承了休谟的经验哲学，却又不满意旧的怀疑论缺少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他们要求哲学和社会科学仿效自然科学实证的、可以验证的方法，以描述经验事实为内容，以获得实用效果为目的，从而建立一种排除形而上学、可以获得知识的确切性和可靠性的哲学。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

19 世纪中叶欧洲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已经证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不能回答时代问题，不能正确解释客观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情况下，这种打击更是致命的。由此产生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实证主义经过第二代“内在实证主义”和第三代“逻辑实证主义”的持续发展，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并由此开始和实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分野——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

其次，当黑格尔哲学在遭到外部打击的同时，黑格尔哲学学派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学派在黑格尔去世后分为左右两翼——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右翼以加布勒（Gabler）、亨利希（Hinrichs）和早期的鲍威尔（Bauer）为代表，这一派放弃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更多的是从神学和基督教教义方面来解释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下，这一派希冀用神学来挽救黑格尔哲学，其结果只能是穷途末路。与此相反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在当时则有相当的声势，施特劳斯（D. F. Strauss）、后期的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对基督教神学的鞭挞，对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的关心，实际上都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反动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和宗教神学批判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辩证唯物主义的最终形成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分不开的。黑格尔学派的衰落和马克思哲学的产生，不仅意味着黑格尔哲学已经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昭示着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和崭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

再次，西方社会有着近两千年的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打破了宗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但这种深厚的宗教传统是不可能消亡的，更何况终极存在、终极意义是人类与生俱来、与人类存在方式密切相关的东西，是永远取消不了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虽然推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但它们取代不了人们对超验问题的关心，更阻挡不了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叔本华和尼采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宗教的批判就显得十分重要，他们在颠覆欧洲文化传统、导致欧洲哲学转型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甚至可以说，近现代西

方哲学是以这两人来划定界限的。

生活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上半叶的叔本华，一方面受浪漫主义之濡染，崇尚自由创造，崇尚情感和美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极不满意动荡不安的现实世界以及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叔本华反对传统观念、反对基督教的神学信仰，反对理性主义的哲学，他对人生、对世界本质都持悲观的态度。不过，他在感叹“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的同时，并未自暴自弃，而是天才地说出了这个真理：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生命意志”，但人可以通过哲学和艺术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勾画生存的条件，从而自我解惑、认识自身。为此，叔本华冲破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生命的界限，在古典哲学内发起了一场革命。他用“意志”来代替黑格尔的“理性”，“意志”成为一种感性的、现实的原创力，这样的意志是非理性的，但却是自由的。但是，非理性的意志并不服从知性的因果律，而现象却必须服从因果律，于是，如何解决这种不服从因果律的“自由的意志”与服从因果律的现象（叔本华所说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叔本华的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叔本华又不得不承认理性的反省思维是认识世界本质的一种可能方式，他转而求助于柏拉图的理念说，并用艺术的理念来否定意志，化解矛盾。意志在艺术理念中得到了暂时的解脱，但艺术理念又带来了新矛盾。叔本华最后就只能转向宗教抑制——禁欲，以求对意志的完全否定。由此看来，叔本华的“意志哲学”的主旨就是对意志的肯定和否定，他的基本问题是探讨欲求和解脱之道，而艺术、禁欲和哲学则是他对世界本质的三种考察方式。尽管叔本华反对理性主义，但他在探索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脱离理性。

尼采受到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他承认叔本华悲观论调的坦诚，但并不赞同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要求人们不再忍受现世的折磨，勇敢地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不断地开创自己的事业。尼采不是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他的信心建立在现实世界的永恒变化之中，而不是来自于那个所谓至高无上的理念。他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权力意

志”，不仅将意志哲学贯彻到底，而且彻底颠覆了欧洲自古就有的形而上学真理观。在尼采这里，作为创造力量的意志不只是决定世界的本质，而且还是道德评判和价值评估的标准。当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就已经表明他与一切旧的宗教信仰的彻底决裂；当他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就已经表明他要彻底清算束缚欧洲思想数千年的“理念论”；当他主张“只要羊群，不要牧羊人”，就已经说明他反对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全面控制，要求全面恢复资产阶级早期追求的个性自由。尼采的批判是犀利的，他呼吁人们从世俗的政权、神学的说教、僵化的理性主义的压抑和说教中摆脱出来，返回到健康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权力意志那里。尼采为人们描绘了一个虚幻的超人形象，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超人身上，然而，这个超人却是那样的虚无缥缈，既不是现实存在的英雄，也不可能是某个民族，说到底，只能是尼采臆想的超人崇拜。

尼采意识到了欧洲传统哲学的束缚和基督教神学的虚伪性，他从自己的层面对它们进行尖锐的批判，企图以一个所谓“超人”来超越现实，化解矛盾。然而，尼采绝对化的思想方式使一些激进的主张走向了极端。他突出了个性的自由，却完全忽视了人所具有的社会性。不破不立，尼采学说的意义不在于建构，而在于他对传统思想的颠覆，正是他的颠覆才为后来的哲学发展扫清了道路。弗洛伊德曾说，他发现自己对生命本能和无意识精神活动的探索，都是尼采已经知觉和猜测到的。雅斯贝斯承认，尼采为存在哲学开辟了道路，存在主义讨论的存在、自我的价值等问题，在尼采那里都已经有所涉及。胡塞尔的哲学虽然与尼采的学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直接面对事物自身、致力于还原生活世界本真性的“现象学”，与尼采反对抽象的理智、努力探求现实世界本原的“唯意志论”进行比较，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妙的。

最后，如果说对黑格尔哲学的摧毁主要来自上述几个方面，那么，我们还必须强调的是，当时攻击和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还有很多流派，比如，新历史主义、新古典主义、心理主义，以及稍后的新康德主义等。

这些学派或许在当时没有那么声名显赫，但它们对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却是不可或缺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的，就是著名的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又称“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特伦德伦堡（F. A. Trendelenburg）。从学理上讲，特伦德伦堡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相当尖锐的。他在其主要代表作《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黑格尔是把逻辑范畴的运动当做客观现实运动的原型的。但如果考察黑格尔逻辑中“从有到无”的第一个基本过渡，人们就会发现，这种看起来像是由逻辑推导出来的辩证法，实际上是“由不愿预先设定任何前提的那种辩证法所未经讨论就预先设定的”^①。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个范畴“变易”（werden）中，纯粹的“有”和“无”都同样是静止的，如果不是黑格尔悄悄地插入运动，那就永远不能发展出自身能够运动的、而且始终生气勃勃的变易这一直观活动。很显然，特伦德伦堡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弱点，看到了黑格尔认识论的主要问题。但是，特伦德伦堡并没有再向前走，继续对辩证法进行认识论的改造，而是向后看，力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诠释，从另一个方面来推进哲学的发展。特伦德伦堡对其弟子们的影响是深刻的，当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术团体，其中有布伦塔诺、狄尔泰、韦尔曼（O. Willmann）、泰希穆勒（G. Teichmüller）、奥伊肯（R. Eucken）等人。此外，存在哲学的先驱、丹麦人克尔凯郭尔也坦诚自己受到特伦德伦堡的启发。这些哲学家对贯穿整个 20 世纪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是直接和明显的。

布伦塔诺和狄尔泰都是特伦德伦堡的学生，他们都对心理学和认识论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后来发展的方向并不一样。布伦塔诺既是一个心理学家和认识论者，同时又是一个本体论者。他关注心理现象和认识论问题，尤其注意说明心理现象的类的特征——意向性，注意阐明心

① 特伦德伦堡：《逻辑研究》第 1 卷，转引自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第 220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理现象与真理、意识与世界的关系。胡塞尔是布伦塔诺的弟子,“他从布伦塔诺那里继承了把哲学看作是精密科学的思想。他和布伦塔诺一样,也从对象转向了心理活动。在他的许多个别研究当中,布伦塔诺的思想构成了他哲学研究的出发点”^①。另一方面,布伦塔诺同样关心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注意研究存在概念的统一性,注意区分作为一般概念的“存在”和“存在着”一词的具体所指。他借鉴亚里士多德对存在的多种意义的界定和范畴论的分析成果,以此去反对那种以存在者的假设来论证存在的统一性的研究。布伦塔诺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研究,对现代存在哲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狄尔泰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一生都在构造他的“精神科学”。他不同意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试图限制实证主义的范围,消除哲学的抽象理论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阂和争论。他把人、社会及其关联当做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强调人是一个具有知、情、意的整体,并且是不断与自然和社会进行交互作用的行动者。因此,他一方面不同意传统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注重对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的继承,同时对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予以特别的重视,把它们视为建构精神科学的重要内容。狄尔泰想建立的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却又从其中吸取某些元素,既不同于以往形而上学、却又关心人类社会的精神科学。这样的精神科学当然是现代哲学开拓创新的尝试,它改革创新、又不流于世俗,继承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对维护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并对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塞尔就多次承认,狄尔泰学说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现象学运动也被狄尔泰的理论所打动,他把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工作看做是现象学的天才的前瞻和准备。海德格尔和后来的伽达默尔也都把狄尔泰当做他们的思想先驱。

正是因为布伦塔诺和狄尔泰对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现象学所发挥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等译,第86页,商务印书馆,1986。

的特殊作用，我们在本卷中不是把他们的学说归于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的范围，而是当做现代现象学的先驱。

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现象学和存在哲学是现代欧洲哲学的主流，它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影响。

胡塞尔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现象学的主要代表。由于时代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学养等原因，胡塞尔是以严格的科学精神来探讨哲学问题的。与布伦塔诺一样，他最初也以心理学为研究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意向性、意向行为、意向行为的结构等意识问题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心理学的考察并未使他发现他所期待的真理的绝对性，而是看到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必将陷入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窠臼的危险。这在胡塞尔是绝对不允许的。胡塞尔的一个伟大抱负就是让哲学第一次建立在严格科学的、绝对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对他来说，“观念”是本质性的，是哲学认识的核心问题。人类原本生活在“观念”的世界之中，这种“观念”是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的纯粹统一。自然科学兴起之后，“观念”的纯粹统一性被割断，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为改变这种状况，胡塞尔提出“直接面对事物自身”，要对事物进行“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不仅要达到一种“本质直观”，认识事物的真相，而且要对经验科学予以超越，返璞归真，不为任何所谓“科学”、“理性”所吓倒。晚年的胡塞尔把这种纯而又纯的真理探索引入到现实社会领域，关注人类的“生活世界”，试图排除一切成见和外部权威的影响，通过现象学哲学的反思去认识生活的真谛和意义。

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把握了那个所谓的“真理的绝对

性”，而在于“胡塞尔排除了使许多思想家感到气馁的原因，他消除了对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忧虑，他给年轻一代哲学家注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①。在原则上赞同现象学方法的哲学家由此发现了现象学给哲学带来的一个新的广阔空间，而反对现象学的哲学家从此以后不得不更加明确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以适应胡塞尔现象学带来的高度科学、严谨的哲学时代。

舍勒也是早期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现象学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将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方法付诸实施的第一人，并把胡塞尔的理论成果当做其事实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且在此基础上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但应当注意的是，舍勒对现象学方法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不同于胡塞尔的。胡塞尔在构思现象学时就与康德的先验哲学相接近，即胡塞尔与康德一样，他们都强调一切对象在原则上来说都是意识所能理解的。而舍勒则认为，现象学方法面对的是具体的事实，它并不要求概念的普遍性和明晰性，重视的是经验的确认和假设，因此，现象学与先验哲学没有直接关系。

舍勒一生的思想发展变化很大，经历了从现象学时期到天主教时期，再由天主教时期到泛神论时期。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著述甚多，涉及伦理学、宗教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批判等。其最富有成果的工作是对情感现象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价值问题、人格（Person）问题、宗教神学问题、世界等级结构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舍勒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唯理论、绝对主义和严格主义所进行的批判使其在欧洲学界声名大振，但他把伦理学的基础看做“是由关于价值和价值等级序列的客观陈述构成的”^②，从而就把伦理学的最基本原则——道德义务从其“质料伦理学”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等译，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86。

② 同上书，第166页。